

病理学家 梁伯强 医学教育家

(1899.2.15~1968.11.28)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伯强家乡故居：梅州市城西禾稿塘贻谷楼

(摄影：杨柏)



鼓励学生超越老师

——记著名病理学家梁伯强

熊 敏



梁伯强是知名教授，他热情扶掖后进，鼓励他的学生超越自己。他多次当众称赞自己的学生和助手“许多地方都比我好”，“比我更好”，反“师道尊严”而行之，平和至诚有加，委实感人至深，足以令学生在老师的赞许声中受到无形的鞭策奋力而前行。中科院院士杨简和一大批他的学生，就是在他的熏陶之下走向人生的辉煌。

梁伯强（1899—1968），著名的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899年2月15日生于广东省梅县上市禾好塘梁屋，1968年11月28日卒于广州市，享年69岁。

梁伯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梁邵勤曾先后在城西小学和梅县女子中学任教，对子女要求严格，勉励子女努力读书。生母梁萧氏是位贤慧、俭朴的家庭妇女。萧氏生有三子，梁伯强居长。在他六岁那年，母染病去世。继母陈招云，性格温柔，疼爱原配三子，深得梁伯强兄弟的爱戴。陈氏生有五子二女。梁伯强自幼天资聪颖。1912年，考入梅县巴色会教会中学（即梅县乐育中学前身），勤奋学习，十分刻苦，每天早起背诵德语词典，用四年时间完成了



1922年7月3日大学医科第九届毕业合影



1952年8月，梁伯强教授等与第一届病理高级师资班学员合影



中学的全部课程，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22年毕业。

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梁伯强深感我国基础医学薄弱制约着临床医学发展，要发展我国医学事业必须从发展基础医学入手。毕业后留校，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卜欧本海姆（FOPpehelm）。教学之余，潜心从事中国人血型 and 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

1923年，梁伯强被学校推荐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继续中国人血型的研究。1924年获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梁伯强在留德期间，除了精心钻研西方医学外，时刻不忘祖国医学，他曾著文阐述中国医学的成就，将《黄帝内经》中有关胃肠道解剖的研究介绍给西方。1925年回国，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在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期间，他常因不同学术观点与当时执掌该院的德国教授争论，表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学而不媚、决不苟同的气派。1932年被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聘为教授兼病理研究所所长，时年仅三十三岁。他深知只有把教学、尸体解剖检验和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病理学才能得到发展。因此，他千方百计开辟尸体来源，指导学生解剖，精心设计教学，培养研究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一心扑在病理学上。他以病理学研究所为基地，认真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他把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研究所，建设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学术气氛浓厚的学术机构。1936年，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H·贝廷格（H·Bthmpr）教授参观该所时，称赞该所是“一个很完善的、极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所”。

梁伯强的研究所创业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病理学，只有从积累国人的尸解材料入手，才能了解和阐明我国具体条件下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因此，他十分重视尸体解剖工作。为了改变旧的传统观念，他耐心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亲自向社会、死者家属，向掩埋队和慈善医



中大病理學研究所全圖



研究所課室



梁伯强从国外带回的解剖器材



院反复宣传尸体解剖的科学价值和人类的贡献，鼓励人们死后献尸解剖。他的努力，推动了病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抗战期间，梁伯强一家随同中山医学院迁入内地，途经越南河内滞留了两个月。尽管流离异国，处境艰难，生活困苦，但他仍以学术研究为重，坚持作尸体解剖。他主动取得河内印度支那医学院的支持，每天到该院的所属医院太平间作尸解。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解剖了30多具尸体，制作了9箱标本，几经周折，辗转运回国内，保证了教学的需要。后来病理研究所到达粤北山区后，他把研究所设在一间土房里。没有尸解室，他就带领学生到几里路外的一个破庙里做解剖；没有工具，他就请铁匠打制土刀、土剪、土秤；没有手套，他使用凡士林涂在手上以减轻福尔马林对皮肤的刺激。在制作标本时，他设计出新的固定液来固定标本，而节省了大量当时难于得到的甘油；改变配方，用松节油代替二甲苯；用云母片取代需要进口的盖玻片。条件艰苦，经费不足，物资供应异常缺乏，但没有难倒梁伯强。他通过改良方法以适应新的工作条件。他因地制宜，坚持病理学研究。



1932年8月，梁伯强赴广西瑶山调查与瑶王、金泽忠合照。

梁伯强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任职期间，曾于1937年至1938和1948至1949年两度出任医学院院长。1949年初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SHOPKINS）等大学考察医学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伯强继续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和病理学研究所主任。1953年，他代表中国医学界参加维也纳世界医学大会；会后赴苏联考察医学教育。在大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为中山医科大学前身），梁伯强任该院病理学教授、病理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任华南医学院第一副院长，主管全院科学研究工作。在他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全院科学研究和活跃全院学术气氛。此时中山医学院（华南医学院后易名为中山医学院），在血吸虫病防治、肝病、麻风病、鼻咽癌、防盲治盲以及神经生物学等疾病和学科的科研工作卓有成效的。1963年，他组建了肿瘤研究所和寄生虫病学、病理形态学、神经生态学、眼科学、药理学等五个研究室兼任中山医学院肿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有力地推动了全院的科研工作。病理解剖研究工作的条件大为改善，这更激励着梁伯强勤奋的工作。尽管他精力有限，行政事务繁忙，但他仍经常抽出时间参加尸体解剖操作。由他创建的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解剖研究室，到1985年末已做尸体解剖近万例，其数目之多在全国名列前茅。由他指导

華南醫學院建校委員會成立紀念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
羅光攝



1952年9月10日，华南医学院建校委员会成立纪念照 左起第一人为柯麟，二排右三为梁伯强。

编写的《病理尸检手册》一书，畅销全国，对推动我国的尸体解剖工作规范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梁伯强1950年任国家卫生部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顾问和地方病防治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国家科委医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华病

理学》杂志副总编辑。梁伯强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梁伯强是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他深刻认识到，要建立现代病理学，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病理资料。因此，他非常重视尸体剖验，亲自向社会、向有关部门、向家属宣传尸体剖验的科学意义。他在尸体解剖室门口挂上“把遗体献给科学功德无量”的横匾。他亲自带领青年教师作尸体解剖。即使到了晚年，身负领导重

任，但每学年伊始，仍坚持为研究生作尸体解剖操作示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为我国病理学的教学、科研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科学资料。

在科学研究上，梁伯强强调结合实际和需要，重视研究地理环境和卫生习惯对人体疾病的影响；重视研究我国常见病、多发病规律。早年从事血型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在《中国人正常白血球血像的研究》一文中，发现中国人正常



柯麟院长梁伯强教授与56届学生合照



血的淋巴细胞比欧美人高；而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其正常血的淋巴细胞比居住在其本土的德国人高，充分说明了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上海同济大学工作期间，便从事肝吸虫和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南来广东后，多年尸解实践发现南方肝硬化发病率高，便着手从事肝病的研究。

他在研究工作中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喜欢登山。所以，常用“登山精神”鼓励他的学生。他说：“研究工作好像登山运动。首先要有信心，不怕艰辛；然后一步一步攀登，一定能到达顶峰。”

梁伯强在科研方面是一位有创见的学者。他重视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性等对人体疾病的影响，重视探索研究中国常见病、多发病的病理学规律。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进行了中国人血型的研究，发表了《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广东血型的研究》等论文。后来通过深入研究，又阐明了中华分支睾吸虫与胆管的关系。他十分重视挖掘祖国医学中病理学成果，曾发表《学习黄帝内经的一些体会》。

梁伯强担任中山医学院科研副院长期间，对领导和组织该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积极发动和组织科研协作，热情关心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

梁伯强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他在担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期间，分管科研工作。对于科研管理，他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他十分重视科研协作，发扬学术民主，审批科研计划时，注重调查研究，听取各科专家及其他科研和教学人员的意见，在统一计划下，尽可能让专家按自己的专长选择科研题目，并允许进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他善于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开创局面。在他的统筹规划下，经卫生部批准，中山医学院在1963年建成了一套科研机构“一所五室”（即肿瘤研究所，眼科、寄生虫学、病理学、药理学、神经系统实验形态学等实验室），从而为该院发展成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中心打下了基础。在梁伯强的倡导下，中山医学院



病理研究所教职工合影，左起：曾志平、杨简、梁伯强、王典羲、袁博之、刘国勋（约上世纪中叶摄）



逐步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氛，学术思想活跃，活动较多，经常汇编出版各种学科论文选集，以学院名义举办地区性或全国性专题学术讨论会，从而迅速地推动了中山医学院科学研究的发展。他多次代表我国医学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赴苏联、美国、朝鲜等国考察，对增进我国与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伯强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成就在肝疾病和鼻咽癌的开拓性研究。

上世纪20年代梁伯强从尸体解剖研究实践中，发现不少原发性肝癌患者伴有肝吸虫感染。1928年他与E·G·诺克（E·G·NAUCK）在《中华肝吸虫传染和原发性肝癌发生》一文中，首先在我国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相关现象，并提出肝吸虫的感染，可能是原发性肝癌的原因之一。但不少西方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并存现象，没有因果关系。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直到1956年才取得共识，确认一部分原发性肝癌是由于肝吸虫感染所致。1956年，梁伯强代表中国医学界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四届医学年会，在大会上他宣读了《有关坏死后性肝硬化的问题》的论文，首先阐明中国有坏死后性肝硬化这一类型，并指出病毒性肝炎是产生坏死后性肝硬化的原因。同时提出在中国肝硬化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营养缺乏和酒精中毒，这与当时国际上强调的“肝硬化的原因是营养缺乏和酒精中毒”的观点大相径庭。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科学研究是探索前人没有认识的事物的本质。既要重视前人的经验，又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框框，这样研究工作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1959年在《原发性肝癌的形态学，病因学和在我国发病率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模式。这一科学见解直到80年代始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当时国际上仅强调黄曲霉素与肝癌发生的关系。此文发表后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来函索取论文，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愿意进行合作性研究。

鼻咽癌是广东地区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居留国外的广东籍人中，鼻咽癌发病率也远



梁伯强教授指导病理师资班实验



比居留国当地居民为高，因此，国外学者称为“广东癌”。1959年梁伯强明确地提出把鼻咽癌研究，作为中山医学院的科研重点。他一方面派人到苏联进修学习；另一方面建立了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机构，成立了鼻咽癌病因室、病理形态室、药物研究室、流行病学室和在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组建肿瘤科。

他邀集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有关单位成立鼻咽癌研究全国协作组。1960年，卫生部确认中山医学院为全国鼻咽癌研究中心，北京、上海、四川、湖南和广西为参加单位。1961年和1962年梁伯强亲自主持召开全国鼻咽癌研究专题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统一部署研究计划。参加单位有北京、上海、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四川等省区市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医学院校，形成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

研究早期，梁伯强首先在广东省雷州半岛、珠江三角洲、西江沿岸和广州市等县市开展群众性普查，弄清其流行病学情况。发现在广东的西江沿岸和珠江三角洲为鼻咽癌高发区，居恶性肿瘤之首位。继而发现广西和湖南两省发病率也颇高。为了早期发现鼻咽癌患者，他提出在高发区对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细胞学普查，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临床治疗方面，梁伯强与有关专家共同研究，改进鼻咽癌患者治疗方法，用放射治疗结合化学治疗取代过去单纯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患者生存率。

在鼻咽癌病理学研究方面，他全力以赴地进行了这项工作，为医学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指导下首创在尸体上完整取出鼻咽部组织的解剖方法，通过精湛的研究首次在国际上系统地阐述了鼻咽癌的组织类型、组织发生学及其生物学特征，为研究鼻咽癌的组织发生和早期癌创造了条件。



1964年3月，梁伯强教授出席华南肿瘤医院开幕式



1962年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上，他宣读了《鼻咽癌的组织学类型、生物学特性和组织发生学的研究》的论文。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鼻咽癌的组织学分型；并详细描述了各类型的病理组织学特点和它们的生物学特性；辩证地论述了肿瘤实质和间质互相关系。这一科学的论断受到国际肿瘤学家的赞同。该文至今仍被视为鼻咽癌病理组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邀请梁伯强参与上呼吸道肿瘤组织学分型（图谱）的复审工作，惜当时梁伯强已逝世多年。

梁伯强对维生素代谢、血吸虫病、化学毒气的防护等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梁伯强受卫生部委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病理解剖学》教材，结束了我国无通用病理学教科书的历史。参与编写的作者是当时各高等院校富有教学经验和学术造诣较高的教授，大量引用了我国的病理资料和研究成果，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

梁伯强晚年致力于肿瘤病理学的研究，重点研究广东多发的鼻咽癌。根据事物相互联系、制约的法则，他提出要注意研究肿瘤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在鼻咽癌的组织类型与生物学特性关系上，他发现不少病例在初诊活检时所见组织学类型为鳞癌三级或呈梭形、大圆形细胞型，但同一病例尸解都转变为多形细胞癌。有些鼻咽癌病人初诊时肿瘤分化较好。随着病情发展，肿瘤发生转移，肿瘤组织学类型也由分化好（恶性度低）转变为分化差（恶性度高）。梁伯强认为，“这不仅是局部的改变，而是与整个机体状态密切相关的。



梁伯强教授主编的书籍

组织学类型的改变是机体反应性改变的表现；肿瘤恶性度升高，说明机体抗癌能力的下降。”但也有一些病人，病情发展慢，而肿瘤间质中有大量淋巴细胞和丰富的嗜银纤维。梁伯强认为“肿瘤间质是机体抵抗力（即免疫功能状态）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肿瘤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梁伯强最早提出“肿瘤间质反应”的概念。在肿瘤病因医学和病理学研究方面，他是首先提出这个新概念的人。

梁伯强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早年悉心培养年青助教，为他们创设学习和工作条件，并谆谆教诲青年教师要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分配来的新教师要经过一年严格基本功训练；他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他们。从作第一例尸体解剖开始，尸解记录、病变描述、病变标本选取、诊断等都要求规范化、高质量和按时完成。他常说：“做学问要勤学多思。”遇到困难时，“走路，吃饭都要想解决的办



法。”他还说：“我的工作计划和科研构思，很多时候是在走路时想出来的。”在学术上他严格要求他的助手和学生，但在生活上对他们又关怀备至，每逢节假日他和他的夫人总是热情邀请他们到家作客，促膝谈心，乐也融融。1936年梁伯强开始接受培养高级研究员。1951年接受卫生部委托培养高级病理学师资。1953年以后，为了适应高等医药教育的发展，他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师资培训班，招收研究生和高级进修员。他培养了大批病理学人才。满门桃李，不少已成为当代学科带头人；造就出诸如杨简（梅县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一批著名病理学家。

梁伯强热爱祖国，为祖国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患病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鼻咽癌研究工作。他治学严谨，在教学工作中，梁伯强埋头苦干，一丝不苟。他编写的讲义，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他讲课生动活泼，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他主编的《病理解剖学总论》和《病理解剖学各论》是建国后第一部统一的高等医学院校病理学教科书，内容集中反映了我国各地著名病理学家的专业特长和教学经验，受到病理学工作者的好评。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每天步行上班，右手拿一把长柄雨伞，在校园内频频与路人点头问好。他善于团结人，与院内外专家教授团结合作，互相尊重，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协助有关专家建立肿瘤医院和当时全国唯一的眼科医院。他学识渊博，而又虚心学习国外的经验和技能，但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却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

梁伯强的一生，闪耀着客家精神。他具有坚毅不拔，百折不挠的作风；勤学多思、开拓进取的精神；关怀学子、爱国为民的品格。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激励他的学生和后人，为发展我国医学教育事业而发奋工作。



【转自《客家名人录》（梅州地区卷）熊敏教授文章，本书略有删改】

1999年11月，梁伯强教授培养过的四名院士（左起钟世镇、甄永苏、姚开泰、程天民）探望师母梁伯强夫人时留影。

深切的怀念

何凯宣



1959年，梁伯强教授指导病理师资班实验(黄书伟提供)

梁伯强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病理学家，德国医学博士。他的门生杨简、李瑛、金泽忠、王典羲和我都不呼其名，而称他为强师。他在学术上的辉煌成就，为祖国所作的卓越贡献，人们耳熟能详，有口皆碑。本文所述，是作者在接受强师教导和帮助的亲身体会。

梁教授和我同乡，又是中学、大学的先后同学。我久闻其名，相识恨晚。

1932年，原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的强师，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医学院病理学研究所教授兼主任。正好我也因“一·二八”日军侵略淞沪，由同济大学医学院转学中山大学医学院，荣幸地成为强师的首批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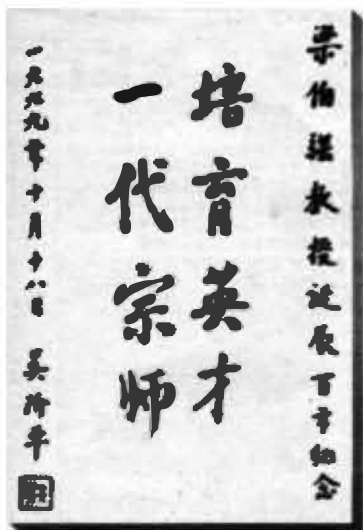
梁教授所编讲义和教学方法都很有特色。讲义是中德合璧的，学生在获得病理学知识的同时，也提高了德语水平。这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担任解剖、生理、药理、内科、外科和妇产科等课程的都是德国教授。上课前强师一早来到教室，将所讲纲要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好预习。标本、挂图等也置于旁边。讲课时以精练的语言表达，密切结合基础临床，围绕纲要发挥补充，突出重点。为了使學生深入理解器官病变的发生发展过程，梁教授精心制作了许多模式图（Schema），授课时边绘边讲。随意加减，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嵌入听课者的脑海之中，历久不忘。

同精彩的讲课相辅相成的是每周一次的病理临床讨论会。名为讨论，实际上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具有非常重要的督促检查、温故知新的意义。这对学习既是动力又是压力。我们都十分认真、紧张地对待，反复学习思考强师讲的所有内容。由于每人均下了苦功，结果没有令强师失望。获A（最优）最多的有杨简、

梅
州
院
士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为梁伯强诞辰百年题字



吴坤平（女）、李仕梅、邝贺龄等人。杨、吴、李分别是八、九、十届的金牌得主。凡事都先有周密的计划，然后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提前完成，这是梁教授事业成功的因素。一想起他提出的《三三计划》，至今仍在鼓舞我们前进：（一）三年内力求发展。第一年主要搞好教学，第二年着重开展尸体解剖和活检，第三年大力投入科研；（二）为战胜人类健康三大敌结核、麻风和肿瘤，特别是癌肿而奋斗；（三）教学、科研和临床三结合。计划的胜利实施，使原有一定基础的病理学研究所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1935年毕业考试结束后，外科马丁教授（Prof Dr. Martin）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助教。由于我志在内科，向他婉谢，此时我正在附属一院实习。对我的前途十分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一天下午梁伯强教授前来找我，漫谈一会之后，转到选择专业问题。他说人各有志，你想选学临床专业，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但现在有一个好机会，你不妨考虑。广东军医学校是新成立的五年制高校，校长张建，梅县人，曾在德国深造，你的父亲和哥哥他都认识。他请了四位德国教授，其中的病理学教授贝廷盖博士（Prof Dr. H. Bettenger）托我介绍一位助教，条件有二：德语好，病理学有一定基础，此职杨简和你均可胜任，但杨简这里需要，不知你有无此意。我们就在校园里边走边谈。强师的态度那么温和、亲切，言词那么诚恳、委婉，当时情景，宛如昨日。

我立即表示，感谢老师的栽培和信任，我愿意珍惜这个机会。从此我任贝廷盖教授的助教，历时两年余。

1940年冬我请假回梅县省亲，张建校长要我联系单位进修病理生理学后才返校。此时有人劝我悬壶济世。正犹豫中，梁教授函电交驰，勉励我坚守教学岗位，并说桂林广西医学院托他代聘一位病理学教师，希望我担任这一职务。来信



梁伯强教授与师生合影



中有的长达千余言。我和父亲读后都深受感动。父亲说：“对学生如此爱护、关怀，大力提携，实在难得，令人敬佩。你必须奋发有为，以报老师培育之恩。”

此时强师随学院从昆明迁到乐昌。我往桂林途经此地晋谒老师。蒙盛筵相待，亲切教导。他说：“凡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要专心教学，不要过问学校行政，尤其不要卷入政治漩涡。同事之间，要团结互助。多读书，勤写作，虚心向别人学习。”这些话我以前和后来都听他说过，也常常以此要求自己，但做得很不够，离老师的期望尚远。

我在广西工作期间，强师和杨简教授都曾前来讲学。这是对兄弟院校，也是对我的有力支持。他们参观了病理学教研室，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适逢学院选送一批教师到德国进修，我任考试委员并负责病理学命题和改卷。此事我也请教了老师和师兄。

非常遗憾的是，强师希望我在病理学方面有所成就，而我终于改了行。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从桂林回到广州，正好母校也从梅县迁回原地，暂代解剖学研究所主任的卓仲杰教授（第三届同学；与叶少芙教授同级）另有高就，院长罗潜教授请我继任。他说：“解剖和病理是姐妹科，由你担任此职，还算合适。我不想勉强你改行，请你暂时主持，共同为母校效力。”我接受了他的聘请。不料年复一年，暂时成为长久。所学半途而废，有负强师愿望。当时梁教授对此并不支持，他认为到其他学院教病理学方为上策。

梁教授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年青一代，扶植后进，不遗余力。像我一样身受其惠的不知道有多少。他对学生和助手倾囊传授，耐心教导，虽然严格要求，从不疾言厉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杨简的才能很全面，许多地方都比我好”，这些话我听过好多遍。在广西讲学时，听众很赞赏他绘的模式图，他微笑着说：“我的助手杨简等绘得更好。”其胸怀磊落，人们都衷心敬佩强师的谦虚和爱才。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深受学生和助手的尊敬和爱戴。

强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乐于助人，朋友遍天下。学术界人士都推崇他。在民国曾任中将军医署长、有学术界领袖美誉的张建同我初次会面时曾说：“你是梁伯强教授的学生，可以信任。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们说他是学术界泰斗、权威，他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贝廷盖博士在参观中大病理学研究所之后，十分满意，赞不绝口。他说：“所内设备和各项工作，完全达到了德国的一流水平。有些项目，如尸解记录，我们还没有要求这样详细。倘非亲自目睹实在难以相信。”他特别赞赏梁教授讲的和写的德语。他问我为什么你老师的德语这样完美（Perfekt）？我说：“梁教授自幼学习德语，经中学、大学、德国，从未间



断；在国内外又与德国教授共事多年；而且他一向勤学苦练，在梅县乐育中学即以早起背诵德文辞典而为人所乐道。德语之难，首在语法，梁教授完全掌握了语法，所以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

桂林任教时，我曾在谷镜教授领导下工作半年多。他也常常谈到梁教授。他说：“尊师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各项工作很出色。有些人学问好，但拙于领导和管理；有的人教学工作突出，待人处世却大有问题，像梁教授这样的全才的确不多。”

建国初期，侯宝璋教授来穗讲学。强师发起欢宴，并摄影留念。我接到他电话通知后，欣然赴宴。他对侯教授执礼甚恭，侯教授也对他很客气。同席有教授秦光煜、彭利、汤泽光、李挺、罗潜和杨简等共十一人。宴会充满友好欢乐的气氛。此照片十分珍贵，我郑重收藏，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抄家后，竟追寻不获。后来侯慧存教授馈赠一张。

“文革”期间，强师患风湿性心脏病。既得不到积极的治疗和休息，又遭受身心的摧残，导致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这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当时我在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并未听到这一噩耗。不料小组会上管教队大声追问：

“苏联广播了梁伯强的死讯，胡说什么‘中国学术泰斗被残酷迫害致死，彗星陨落，举世同悲’。是谁泄漏了国家机密？”其意似将我们列为疑犯。其实管教队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而苏联的广播正好说明梁教授在国际科学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强师虽然过早离开我们，但他的功绩永垂不朽，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何凯宣，梅县西阳人，医学教育家。1935年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先后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暨南大学医学院执教，主译《人体组织学和显微解剖学》（W.Bargmann著，1959）等，献身医学教育事业50余年；精通德语，任中德医学学会理事，为促进中德两国医学交流和合作做出了贡献。）



梁伯强培养学生，既严格又细致，被学生称为“严师慈父”。